

意识形态与新马四十年社会变迁

20292

陈松沾
(地理系第七届)

引言

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的社会面貌产生巨大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改变往往导致社会的重大变革与人民生活的改进。证诸中国自解放以来到今天,不同阶段的政经局面、社会面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势,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意识形态变化带来对社会的强大冲击。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改变使中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的,在新马,意识形态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使我们的社会随之变迁。

由于新马社会的种族、宗教与语言文化的多元性,意识形态与之交织因而形成复杂的社会情势。本文只求宏观的阐述而不作细微的考察,因而本文仅仅从主流政治切入来讨论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旨在说明这四十年两国在意识形态上较大的转变与其所造成的政治社会局面,从而窥视其将来的发展和影响。

从意识形态的分野来说,新马这四十年社会变迁脱离不了三股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势力消长。首先是共产意识形态与非共意识形态的博弈,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延长部分,属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范畴;再来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较量;最终就是民族

国家立国方略与国族营造的利害权衡。

当我们谈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社会这四十年来的变迁,自然是指自从新马分家以来的四十年,即从1965年起至今2005年这个时段。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无奈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结束了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一个“特殊的州”成员的地位,也毁灭了新加坡行动党及其秘书长李光耀在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宏图。新马人民被迫接受新马分家的事实,痛苦地去面对一个“割裂的马来亚”的现实。从此许多家庭一家人被迫分裂成为两国人,要去承受由于新马分裂所带来的政治纷争的压力、为此后各自的政治前途做出痛苦的抉择。在马来西亚成立以前,无论哪一个党派、哪一族人在政治地域观念上,新马从来就是一家子。马来亚就是马来半岛加上新加坡岛,新加坡岛是马来亚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65年这看似偶然的政治突变,从此割裂了马来亚,改变了新、马社会发展途径,造就了此后新、马社会变迁迥然相异的图景。

历史是不能分割的,1965年以后的历史,事实上与之前所发生的事紧密相关,因而这四十年社会变迁自然脱离不了前此历史的影响。

民族国家与新意识形态

所有于二战后,在民族民主独立运动中产生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在持续的冷战当中寻求意识形态的依归、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却必须面对立国根本与解决实际的民生问题,发展经济以增强其民族或国族及其国家实力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主题。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著名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一书中写道:

“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19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论争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蕴含着20世纪50年代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

和民族强盛。”¹

丹尼尔正确地论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旧意识形态的交替情势。新马政治发展正处于这个阶段，1965年分家后，新马两地虽越走越远，但也不得不走民族国家的道路。1965年以后的国际局面，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政治局面，更突显亚洲民族国家的政治特征，国家利益重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新马在分别自治与独立后，立即面临建国的难题，民族与国家的需要重于一切，开始寻求可行的经济立国方案。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分家的时刻，这课题显得更为迫切。到了70年代，新马的立国方略与实践基本成型。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局势的进一步演变，使到区域合作变得更为必要²，因而更突显了这个趋势而更着重于务实政治的耕耘。

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的确在

新马产生积极的作用，两国都先后取得经济长足的进展。然而，在新马，民族国家绝非如西欧“一族一国”由文化民族组成那么单纯，而是一个多元的结构，是一个政治民族的复合体。按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民族定义³，新马各民族在民族国家成型后，应已成型为新马的政治民族或称国族⁴。事实上，马来西亚的政治民族仍有待成型。政治民族是“臆想的共同体”⁵，他牵涉到主权、宪法、公民资格与权力等敏感内容。马来西亚以单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替代国家意识形态严重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致使“马来西亚人”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新意识形态（真正的国家意识形态）无法产生其凝聚力。相对而言，新加坡以强势的国家意识形态取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构成“新加坡人”这个政治民族的符号而取得相对强劲的经济成长与国力的上升。

新马立国后共产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式微

在新马，事实上丹尼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则远远尚未完结。在区域性意识形态兴起时，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与“右”的斗争还在剧烈地进行，这之间的交替和转换以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完成。事实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在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高涨否定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议题⁶。

在那个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仅在冷战、而是以惨烈的热战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印半岛的战争正从越南扩展开来，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的共产游击战也迅速地进行。处身泰马边境的马共，也在中国的支援下重整旗鼓，于1962年实行新方针政策，从

¹.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62) 第403页。中译引自张国清序：“丹尼尔·贝尔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². 东南亚区域合作始于“亚细安”或称“东盟”的创立。作为一个东南亚区域合作组织，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及泰国五国外长发起，于1967年8月8日在曼谷宣告成立，签订了“曼谷宣言”。这个组织最初的目的只是促进成员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之后，汶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陆续加入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大东盟。1971年11月签订了“区域和平、自由与中立宣言”，1976年2月在峇里岛发布了“亚细安友好合作宣言”并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1987年12月为加强各方进一步合作与发展，修订并签署了“友好合作修订协议”。“亚细安”组织已逐渐从单纯的经济、文化合作发展到区域政治协调与合作，形成成为区域经政共同体。

³. 斯大林在其著名篇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问题”为民族所作的定义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

⁴. 有关“民族”与“国族”的讨论，请参阅：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Montserrat Guibernau: Nationalism,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S.A., Polity Press, 1996等书。

⁵. 参阅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0 (1983)。

⁶. 自50年代中期中苏论争开始至1965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共产激进主义开始成型，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正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先进理论指导。

57年后的“偃旗息鼓”退伍政策转变为招收新兵、重建武装、开展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游击战⁷。在新加坡，左翼正式与行动党决裂，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以之抗衡⁸。在马来西亚，劳工党、人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则更加团结起来组织起统一战线称为“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⁹，为争取在马来亚及后来马来西亚通过宪制途径实现社会主义立国而努力。

五六十年代是伟大的年代，全世界都卷入意识形态的壮烈斗争之中。五十年代是全世界反帝反殖的年代，亚非拉许多殖民地掀起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纷纷取得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六十年代则因民族主义的膨

胀致使世界情势的转变，也因而导致共产意识形态产生分裂。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的克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到批判、中国对苏联大国主义的不满和矛盾，引发中苏思想分歧的论争，到了六十年代则全面白热化。中苏决裂，毛泽东正式发起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全面批判，形成共产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剧烈斗争。从中共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九评》¹⁰，这股斗争思潮强烈地影响着全世界的反帝反殖的斗争，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无不波及，并在这意识形态斗争中做出取舍、认清方向。毛泽东的激进思想形成毛泽东思想，成为世

界革命的最先进意识形态。这也明确显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中心已经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也在1965年，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更进一步把斗私批修发展到极致，从而这最激进的意识形态席卷全世界。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左翼紧跟这股激进思潮，也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在新、马开展对内对外的大批斗。两地的左翼最终放弃宪制斗争的途径，走出国会，搞起所谓议会外群众斗争¹¹。

1965年新马分家时，马共没有很好地掌握这分家的政治现实，主观上仍然坚持着马来亚的政治地域概念，从而无法摆脱固有政治理念顺应或主动掌握新的政治形势做出

⁷ 马共总书记陈平于1961年抵达北京，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中共由邓小平处理与马共的关系问题。陈平原意在于征询中共关于马共是否继续还是结束游击战争的意见，中共以世界范围内以及中印半岛和印尼开展的共产主义斗争的有利情势，鼓励马共重振旗鼓，并给予财务和其他物质与道义的支持，马共随即开展“新方针”政策。

⁸ 马共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4年以来所形成的反殖统一战线，到行动党于1959年大选胜利后，裂痕越来越大。1961年，由于李光耀政权对“马来西亚”建议的全面支持与推动以及建国理念的强烈分歧，反殖统一战线终于瓦解。参阅：C. C. Chin: *the United Front Strategy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in Singapore during 1950s and the early 1960s*, Singapore, Symposium on Path Not Taken: Political Pluralism in Postwar Singapore, 14-15, July, 2005; Lee Ting Hui: *The Open United Front*,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6, 第188-200页。

⁹ 1957年6月，马来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人民党、劳工党与人民进步党取得协议，筹组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同年8月31日，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正式成立。参阅：《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年，第148-155页。

¹⁰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是中共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发表意见，主要针对克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反斯大林的态度而发。文章以辩证的分析，论述了苏联、苏共与斯大林的贡献，也批评了错误的方面。特别就个人崇拜问题作了深刻的讨论。于同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前文的续篇，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苏联、苏共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尖锐的问题，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联与波兰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与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中苏论争公开化的开端，也开展了中共正面对苏联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批判。情势的恶化出现在苏共二十二大时，克鲁晓夫公开指名批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在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共，促使论争全面激化。1963年7月14日苏共在《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达三十三万字的长文批判中共。自1963年9月6日起，中共中央发表了九篇评论答复苏共的《公开信》，称为《九评》。详情参阅：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¹¹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而宣告独立，引发左翼内部“新加坡是真独立还是假独立”的论争并因此造成内部分裂。12月31日，社阵议员林煥文基于分歧的原因，辞去其红山的议席，行动党政府立即宣布进行补选，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抵制补选并从此确立杯葛国会的政策。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则在1965年7月起，人民党与劳工党因语文问题产生分歧，发展为不可协调的矛盾而终于1966年1月16日正式解体，而劳工党则因党内对今后斗争方向与策略产生分歧，特别是“议会斗争为主，议会外群众斗争为辅还是议会外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斗争路线的论争，演化为吡叻分部与中央的对抗，对抗终于扩大至全党各州支部，吡叻、雪兰莪、柔佛及马六甲等分支部分别成立反右支联，采取对中央激烈的斗争，1969年，劳工党终于步新加坡社阵的后尘，抵制大选。参阅：阵线报出版委员会编印《党主席李绍祖同志提呈第二届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书》，1967，第36页；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编《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2001年，第337-340页、第373-375页、第394-402页及第626-636页；陈剑“浅谈意识形态与劳工党的斗争”，见陈剑虹主编：《马来亚劳工党党史研讨会论文集《一石千浪》》，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委员会出版，2002年，第33-46页。

相应的改变。新马左翼则因此分裂。一派沿袭固有信念，跟随马共，坚持马来亚的斗争；一派则接受新马分家的现实¹²。马共与新马左翼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开始后，便一直紧跟中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路线。1965年以后，追随中国文化大革命，奉行毛泽东思想，走的是极左的革命路线¹³。

在新加坡，自从李光耀在1963年2月2日以“冷藏行动”大逮捕¹⁴，进一步全面掌握了政治主动权之后，左翼或马共均无法发挥其重大的政治作用而在主要政治舞台上无能扮演积极的角色。在马来西亚，马共继续追随着中共的路线，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行着乡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于1970年派遣多个突击队南下¹⁵，建立在马境的游击根据地，然而却无多大建树。中共自1976年推倒四人帮后，开始了务

实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市场经济路线，终于结束了输出革命的道路，放弃对马共的支持而马共不得不寻求和平的道路，放弃武装斗争，而在1989年12月与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谈判成功而签署和平协议下山，结束了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¹⁶。

新马左翼则因为一方面受着极左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屡遭新马政府的严酷镇压，促使左翼对宪制斗争完全失却信心，不再存有幻想。新加坡社阵首先退出国会，展开街头斗争。马来西亚的社阵则因人民党与劳工党在语文问题上的论争不能妥协而退出社阵，致使这左翼统一战线因而瓦解。劳工党则步上新加坡社阵的后尘，杯葛大选，在全马各城镇大搞议会外群众斗争¹⁷。由于这极左的路线与行动严重地脱离群众而导致整个左翼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先

后于70年代初及其后致使组织全面瓦解，新加坡社阵无疾而终而马来亚劳工党则于1972年注册被吊销而结束。六十年代末，过半左翼上中层领导以及众多基层干部都遭逮捕监禁，左翼运动已呈半地下斗争状态。1969年五一三种族大屠杀¹⁸之后，部分左翼正式转入地下，纷纷组织地下革命组织如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马来亚爱国阵线、马来亚独立同盟等等，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马共的第五及第六突击队分别为五六十人及八十至百多人（除由边区南下的数十名游击队员外，其余都是当地上队的上述地下成员）、分散于吡叻与彭亨两州继续战斗外，新马公开左翼运动基本处于瓦解状态。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四

¹² 新马分家后，新加坡左翼对此发生严重分歧，以林清祥、陈辛为代表的工团左翼及社阵高层如林煥文、高棋生、蒋清潭等人均认为新加坡的独立是真实的，而以社阵主席李绍祖为首的一派则坚持马来亚的政治地域概念，坚称新加坡的独立是假的，此分歧发展为左翼的全面分裂。参阅：《党主席李绍祖同志提呈第二届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书》，阵线报出版委员会编，1967，第34-40页。

¹³ 马来亚共产党先后于1965年1月31日发表《马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正式公开全面支持中共。于1965年3月15日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并发表《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宣言》为粉碎“马来西亚”，实现马来亚真正独立而斗争。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马共立即于次日，即1965年8月10日发表《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关于新加坡被分割出“马来西亚”的声明》。

¹⁴ 这是新加坡、马来亚联邦及英帝三方政府组成的内部治安委员会为马来西亚的成立铺路而采取的大逮捕行动，代号“冷藏行动”。在这一次的逮捕行动中，原定要逮捕165人，但总共115名社阵中央与各支部以及在工运、农运、学运、文运包括校友会等组织以及文化与教育团体的重要领导人及高层干部遭到逮捕，特别那些在57年以后浮现在这些组织中的马共党员与其外围组织反英同盟的干部，如果来不及逃脱，便都悉数被捕。参阅：《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联合早报出版，2000（1998），第530-531页。

¹⁵ 从1968年起，马共先后派遣七支突击队南下马境，即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二、第十四、及第十六突击队。分别活动于玻璃士、吉打、吡叻、彭亨与吉兰丹等处。其中第六突击队战斗最为坚韧，牺牲最大，一度发展至三百人左右，最南深入到雪兰莪乌鲁冷岳，并转战于彭亨中部到1988年。参阅：方山编著《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册，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5年，第21-35页；张佐《我的半世纪》，吉隆坡，张元出版，2005年。

¹⁶ 参阅：General Kitti Ratanachay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alaysia and Thailand, Truce Talks ending the Armed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Bangkok, Duangkaew Publishing House, 1996; 方山编著《见证和解与回马：纪念回马十周年》，21世纪联谊会出版，2002年。

¹⁷ 见注11。

¹⁸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华巫之间种族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宪法规定的马来人特权问题一直争议不休，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竞选口号引发巫统的不满，众多的分歧最终造成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被逐出马来西亚而独立。1969年5月马来西亚大选，种族特权问题争议更烈。大选结果，执政党联盟（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组成）获票率只得48%，在104议席中只获得66席，并且几乎失去雪兰莪及吡叻州议会的执政权。反对党方面，特别是华人为主的政党民主行动党及民政党获得意外的胜利，民政党并获得檳城的执政权。两党胜利游行，特别在甘榜峇鲁（Kampong Bahru）州务大臣住宅附近都认为有挑衅的意味。巫统亦于5月13日下午举行胜利游行，游行携带长刀，接着，便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大屠杀事件，成百上千的无辜华、印族市民遭殃，是为“五一三事件”。

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东欧各国纷纷脱离苏联的控制，推翻共产政权¹⁹。国际共产运动趋于崩溃，冷战结束，共产意识形态的渐次式微，新马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斗争也趋于平静，人心开始转向。这时，新马民族国家经济建设取得成效，处于腾飞状态，这更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面貌。

新加坡的立国意识形态

让我们来审视 1965 年新马分家后，两地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什么表现。分家后的情势是，新马之间不但越走越远，而有各走极端的趋势。

新加坡不得不走民族国家的道路，虽然基于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关系，必须由衷地奉行种族平等政策，以争取国内外政治的安定。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在没有资源的条件下立国。李光耀说：“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²⁰他又说：“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效率……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 and 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²¹。任何国家，

立国后第一要务实便是解决立国根本与民生问题。新加坡自然无法例外，事实上，自 1959 年自治以来，行动党本着其建国原则，首要任务是解决新加坡严峻的住房与就业问题。一方面在政治上面对着与左翼意识形态剧烈斗争中谋求出路，一方面需负起执政党的责任立即发展国家经济与解决人民生活的难题。李光耀与其人民行动党面对的是严峻的政治考验。在立国的政治考量上，李光耀把新加坡的出路建立在与马来亚联合邦的合并上，对英殖民政权所炮制、由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来的大马来西亚概念立即赞同。这当中，也有李光耀的政治野心和伟大宏图。因而在 1965 年退出大马前，他把工作重点都放在于大马建立行动党的架构和网络以及上以及与巫统为主的联盟的政治角力方面，一方面则在新加坡的建设上着力。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新马，特别是新加坡，地处东南亚的要冲，对大国特别是英国而言，在其环球政治、经济、军事的运筹帷幄各方面都特具战略地位。英殖民政府由于新加坡对英国远东策略与战略的重要性，一路来对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便分别对待，在政治上，一直以来都采取分而治之

的策略，新加坡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有别于作为英国属地的马来联邦²²。

由于英国殖民政策对新加坡的特殊性，也造成人口种族成分的差异性。东南亚一直以来便是华人南移开拓农、工、商业之地。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理位置最为适中的一个商业城市和世界最大转口贸易港，众多华商以新加坡为基地，发展东南亚的商贸，势之所趋，大量中国移民前来新加坡。英殖民政权自然高兴看到华商所带来的繁荣兴盛，对于大量华人移民则喜忧参半，故而在移民政策上，时松时紧。最终，华人人口占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成为马来亚华人人口最多的城市。从种族政治的角度去考量，这是后来在合并入马来西亚时，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在当时，新加坡作为一个“市”加入马来西亚，加上沙巴及砂劳越的华人人口，华巫人口对比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位置²³，带给马来西亚总人口一个相当具冲击性的政治因素。因而一旦政治形势出现倾斜，势必引起某方面的情势紧张或政治恐慌。

英殖民政权的种族分化政策造就了新马种族政治体制。合并后的马来西亚，一直处于种族紧张状态，一度还引发了在新加坡

¹⁹ 1989 至 1990 年，东欧各国相继出现社会动荡。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东德）相继变色，接着，捷克斯拉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共产政权全线崩溃。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国旗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参阅：周新城、关雪凌等合著《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经验教训》，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

²⁰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1998）年，第 16 页。

²¹ 《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 年，第 59 页。

²² 英帝自占领檳城、新加坡与马六甲并开发为其东印度公司所属的港口以来，一直把这三处划为英国直辖殖民地。1946 年，英帝殖民政府提出“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马来亚宪制白皮书，及之后提出的“马来亚联合邦”宪制蓝皮书时，单独把新加坡剥离，照旧保留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²³ 按 1964 年马来西亚的人口统计，马来人占 40.6%，华人占 42.2%，印度人占 9.4%，其他占 7.8%。如不包括新加坡，则同年马来西亚人口的比例为：马来人 45.9%，华人 35.7%，印度人 9.6%，其他 8.8%。

的种族暴动²⁴。从事情的起因来研究，不难看到这种族暴动背后的政治原因。历史没有假如，但以情势推理作为可能性研究还是许可的。因而我们设想得严重些，对合并两年的两地政权的合作与冲突看来，假如1965年新马不是采取分家的办法，而持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话，我们实在不难推断五一三种族大屠杀将提前到来。而在当时的情势，冲突还可能严重升级，甚或变成类似南斯拉夫的种族战争²⁵。历史若走了那样一条路，这四十年社会变迁将又会是一个什么模样？1965年割裂了马来亚，新马分家形成定局，这历史不可逆转。往后多少年，新马有可能再次合并，我们无从揣测。但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指标可以说明，那就是只要新马仍然奉行种族政治，再合并无由企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依靠马共与左翼的力量取得政权后，立即全面进行对马共与左翼的封杀，逮捕左翼领袖、封禁左翼团体、削弱左翼的力量，极力摧毁共产意

识形态²⁶。1965年以前，行动党主要藉马来西亚政府对付左翼。1965年以后，则需亲自更雷厉风行地执行镇压左翼的政策。在意识形态上，与左翼划清界限，巧妙地以国家民族主义作为新意识形态来团结国民，确立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民生政策，标榜议会民主、民族平等、经济建国的务实政策，建立民族国家。实行一党专政、威权政治的统治，以务实主义、以外资建立和发展国家经济。作为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处于动荡的东南亚、夹在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如果没有大国的支持与作为后盾，处境是十分脆弱与危险的。然而寻求任何一个大国作为后盾都极易成为附庸。新加坡以多国外资入驻新加坡，一方面通过外资进入国际市场，一方面外资成了新加坡的保护盾牌。新加坡逐渐从外资的引进发展经济和累积并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在独立之初，如何使国人能齐心一意来共同建国？新加坡刚

从混乱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刚从与狭隘马来民族主义的较量败阵下，如何整合人民的思想，为立国建设奋斗而不再纠缠于各种政见的争辩，李光耀与行动党把“国家存亡”摆在了一切考虑的首要地位。从这开始，因势利导，在国民意识的塑造与建立方面，行动党有计划、有步骤地以忧患意识、外来与内在的种种威胁、经济立国的需要等共同课题，一再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一再塑造新加坡人的共同信念，建立国民归属感²⁷。工业化、现代化、“新加坡民族主义”（新加坡国民意识）实际上是新加坡立国与维系人民与统一思想的“生存意识形态”²⁸。从此，行动党人不再提起前此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以务实主义挂帅。这种务实的意识形态最初为着建设国家政策的合理化而设，后来渐次从经济领域展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新加坡立国后长达二十年的时段里，这意识形态为行动党造就了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投资环境、安定合理的劳

²⁴从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过后，巫统秘书长塞加化阿峇藉马来前锋报不断攻击人民行动党及李光耀，并在各种课题上挑拨新加坡马来群众的种族情绪。终于在1964年7月21日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日，2万5000名回教徒的游行中，爆发种族冲突事件，共23人死，454人伤。参阅：《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第610-616页。

²⁵1992年4月南斯拉夫联邦在其共产政权解体后，作为凝聚力的共产意识形态消散于无形。南斯拉夫联邦再分裂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拉文尼亚、波斯尼亚/赫尔采格维那（简称波黑）、马其顿与蒙特内格罗等数个小国并立即陷入种族、宗教灭族仇杀战争的泥沼中，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两国卷入了波黑的穆斯林、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族之间的战争，使之成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惨烈和残酷的战争。参阅：周新城、关雪凌等著《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经验教训》，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2-314页；Patrick Brogan: World Conflict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1998(1992), 第437-453页。

²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当时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李光耀及其同僚均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需依靠马共及其强大的左翼工农及文化团体的支持。1958年4月，方壮璧代表马共会见李光耀，讨论即将到来的大选问题。1959年5月30日大选，马共发动左翼力量和群众，全面支持人民行动党赢得压倒性胜利，获得立法议会51席中的43席。参阅：《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第324-332页、第407-409页；方壮璧“〈天若有情〉谈笑间乘对赛·扎哈利先生〈人间正道〉的批评的初步回应”，2001年。

²⁷参阅：李光耀于1966年6月5日在新加坡大学对学生的演讲，Singapore Yearbook, 1967第27页；吴作栋于1988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国会的致词“Agenda and Action: Goals and Challenges”，Green Paper to Parliament, 1988。

²⁸参阅 Chua Beng Huat: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第2页。Diane K. Mauzy and R.S. Milne: Singapore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第51页。Chan Heng Chee: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65-1967,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第48-53页。

工制度、活跃的商贸空间以及成功地解决失业问题（1965年失业率为14%）到全民就业、居者有其屋计划成功改造新加坡的居住条件、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²⁹。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是在一党独大、政治权威合理化的条件下取得成就，使新加坡从一个殖民地转口贸易港迅速发展转变为工业化现代国度。行动党标榜民主社会主义，但在经济建设上，新加坡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³⁰。英军撤退时期，新加坡一度面对困难，但工业发展计划取得长足的进展及大量外来投资疏解了这个危机³¹。行动党政权在经济发展上充分发挥其作用，政府全面控制了工会，一方面制定了有效的劳工政策和相

关法令，有效地钳制了工人的罢工行动；一方面以协商与仲裁程序，保障工人的利益。这些措施创设了和谐的劳资关系，从而完善了稳定的工业环境³²。威权政治管理的成效可从逐年增加的新加坡人均收入中看到。它从1959年的四百元美金增加到1990年的一万二千二百美元，从1999年的二万二千美元增加到今天的三万五千美元。这在二战后成立的民族国家中属佼佼者。

行动党通过由政府设立的广泛的基层组织而不是党支部来贯彻其意识形态与各种政策，也通过这些组织达到培养人民参政的意识并收集民意³³。显然的，也避免人们认为这些基层组织为政府的代理人而裹足不前，行动党另

设许多其它渠道例如民意组、以及社区、社团、青年组织等组织不定期对话，以达到既获得民意所向，又做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对各种政策的讨论与说明。每年的国庆，势必隆重举行，并通过不断宣扬的生存危机与建立“新加坡人”的共识，以为培育、强化和灌输国民意识³⁴。自进入1980年代，行动党加速了其自我更新的过程，大量招纳杰出专才以增强党的实力与新陈代谢，保持党的年轻化。行动党在建国实践中强调政治稳定优先于政治民主，而政治稳定需建立在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基础上。“一党独大”与“指导性民主”或“家长式民主”强调全民的一致性、纪律性和统一性，国家的需要凌驾个人甚或社会的

²⁹ 1959年自治时，屋荒是新加坡严重的社会问题。“84%市区居民住在拥挤的店铺与木屋区，其中40%居住于贫民窟及窝棚之中。1965年独立时，人均居住面积只得6.9平方米”。行动党于1960年，成立建屋发展局，大量建造组屋以解决屋荒，并创导“居者有其屋”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65年，总共建成54000间组屋。至“1989年，人均面积达到21平方米，98%的人民解决了住房问题”，根据2005年的统计，全民85%人口居住于政府建造的高层组屋而其中超过90%拥有组屋的所有权。参阅：建屋发展局历年常年报告。引文参阅：马志刚著《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426页。

³⁰ 当年的副总理吴庆瑞是新加坡的经济规划师，精心策划新加坡的经济转型，建立制造业，使新加坡从依赖转口贸易经济转变为导向型工业出口型经济。他在1961年，成立经济发展局，1968年成立裕廊镇管理局，积极引进跨国外资并提供一站式投资服务。另一方面，大力培植国家企业，以国家资本建立，以私营方式经营的政联企业，成立数个控股公司如淡马锡控股、胜利公司等来经营如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航空公司、三巴旺造船厂等数个造船厂、新加坡科技从事电子产品/武器装备制造、国企贸易公司等数十家国家企业，实质上仿效日本及欧美的跨国企业经营，取得辉煌成就。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方式被普遍称为“新加坡模式”。参阅：经济发展局历年常年报告；马志刚著《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80-125页、第218-225页。

³¹ 英国在新加坡的驻军达25000兵员并拥有许多重要军事建设与配备。1968年，英国开始自新加坡撤军，于1968至1971年这三年间，新加坡蒙受丧失英军开支（约占生产总值的20%）和面对三万以上军事基地工人失业。参阅：《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第63页。

³² 二战前后，新加坡工运基本上掌握在马共与左翼手中。1948年6月20日紧急法令颁布后，左翼工会几乎全数被禁而致使工运全面瓦解。1950年代伊始，英帝殖民政府再度开放工会注册，左翼工会再度组织起来并渐趋蓬勃，罢工频繁。1953年至1960年代中，左翼工会成为反殖群众运动的基层组织。1961年马共与行动党的统一战线崩溃后，双方都在争夺各条战线的基层力量。行动党一方面组织全国职总以取代马共控制的左翼工会，一方面对所有左翼工会采取镇压与封禁的措施，终于全面掌控了新加坡的工运。这是行动党政府为稳定工业环境，为外来投资制造一个劳资关系稳定的工业发展局面。为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职总扮演工人的谈判代表，一方面疏导工人的情绪，一方面以协商的态度为工人向资方争取基本工作条件。

³³ 行动党于1959年执政后，立即在各选区成立众多的居民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并在其中设立人民咨询委员会，以作为亲民、与民沟通、颁布政策、解析政策、收集民意、教育民众、基层参政等多功能的基层组织。民众联络所在近年改称为民众俱乐部，除保持原有的功能外，并增加众多康乐设施、主办更多亲民、青年文娱及康乐活动，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该区的国会议员自然成为该联络所或后来的俱乐部的当然顾问与指导并在其中接见民众。这是行动党非常有效的政治外围组织，发挥着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高效率的政治疏导与沟通的作用。

³⁴ 新加坡政府每年花费在国庆庆典上的费用相当不菲。这也是建立和打造国民意识的重要工具与场合。2003年新马在水供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新加坡以水供危机感教育民众，并在当年的国庆典礼上，参与庆典者人手一支以食水再生技术生产的“再生水”，在总理的带领下，共饮再生水。这是具有经典性的国民意识营造的举措。

需要³⁵。因而偶有“不愉快的政策”，人民基于国家的理由不得不接受。这种新加坡式的民主、民权、与言论自由经常引起世人诟病。这正是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部分。

马来西亚的立国意识形态

马来西亚虽然在1957年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积极谋求经济发展，1963年大马成立后，更扩大了立国的条件，然而，由于巫统主宰着大马的政治主权，奉行种族政治路线，造成严重的种族两极化³⁶，始终无法实现稳定的政治局面。1965年分家以后，更巩固了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基础，一切皆以种族利益为依归，以马来族统领马来西亚政治，实行马来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奉行的是狭隘的马来民族主义。这是马来西亚政治的悲哀，至今无法摆脱。1969年五一三种族屠杀事件更让国会选举蒙羞，摧毁了原有的国会民主。巫统通过紧急法令军政掌握了全盘的政治主动权，全面奠定了狭隘马来民族主义的统治³⁷。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企图沿用新加坡行动党当年提出的口号，在马来西亚继续所谓“马来西亚人

的马来西亚”³⁸的斗争策略，但最终摆脱不了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樊篱，而步了马华后尘走了种族集团主义或族群主义（Communalism）华人政治路线以赢得选票。

马来西亚所走的经济建设道路实际上与新加坡塑造的民族国家建设途程相类似，所不同的是新加坡缺乏资源和土地，必须走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道路，而马来西亚则可以大量发展资源开采和加工的道路，显著的是石油工业与棕油业的开发。同样地，马来西亚以工业化、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以立国。然而，严重的损害来自其企图建立的“民族主义”却是狭隘的马来沙文主义。历史事实一再证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一个多元民族与文化的国度，最终将导致种族仇视与争斗，悲剧性的例子便是南斯拉夫。在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马来西亚在不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悲剧政治的情况下，将会走向一个怎样的结局，实在值得三思。

马来西亚在建立民族国家这方面似乎与新加坡并无矛盾。靠着丰富的资源，马来西亚在振兴

经济方面，应该比新加坡容易。然而，新加坡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国际金融的架构；展示在投资者面前的对左翼工运的钳制；并以由行动党主导的职工组织建立和谐的劳资合作局面；反对党的式微、行动党一党专政的形势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廉洁而高效率的官僚系统；务实优惠的投资政策加上一条龙的投资服务，在引进外国投资方面卓有成效。在短短的十年间，新加坡便走在东南亚各国的前头。马来西亚同样地采取积极振兴经济的政策，一方面积极收购英国人留下的产业，一方面开拓能源，大力发展石油工业，开拓棕油业。然而，由于民族意识形态的偏颇，经济发展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马来族宪法保障的特权一直是马来西亚政治的毒瘤，长期以来，宪法上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形成的种族不平等³⁹，致使其他种族在各项发展上都不敢做长期的投资和打算。政治的不安定一度还造成非马来族的移民现象，外资因而裹足不前。比之新加坡，形成经济发展上的滞后现象。

马来西亚业企图以发展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统领人

³⁵. 参阅: Diane K. Mauzy and R.S. Milne: Singapore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第128-142页; Chua Beng Huat: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第7, 14, 191页; Simon S.C. Tay: Imagining Freedom, in Annie Parker & Tong Chee Kiong (ed): Imagining Singapor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92(2004), 第81-102页。

³⁶. 参阅: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著《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1987年，第5-27页。

³⁷. 五一三事件见注18。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次日，联盟政府立即解散国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四日后，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以副首相敦拉萨为主任，变相实行军管并逐步推行马来化政策，推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落实土著政策、大力发展马来学校、教育与文化。

³⁸. 见注18。

³⁹. 1947年，英帝殖民政权与苏丹及巫统所达致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便规定了马来族作为土著的特权。英帝以其分而治之的政策落实到宪法中，从此形成马来亚及后来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局面。参阅: Khong Kim Hoong: Merdeka! British Rule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in Malaya 1945-1957, Kuala Lumpur, Strategic Inform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SIRD), 2003, 第108-175页; Albert Lau: The Malayan Union Controversy 1942-194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民一道建设国家，却仍然是个种族政治挂帅、民族不平等、持续着文化与宗教的论争和冲突、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显著的不稳定社会。由于经济分配不均衡，阶级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这些年来，马来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与阶级矛盾，明显地说明这些与民族国家立国原则相悖的情势将带给马来西亚灾难性的冲击。自1970年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真正得益者除了封建集团外，便是新兴的统治垄断集团与分得一羹的为数不多的新兴中产阶级。大部分的马来农民与小有产者仍然处于社会的底层。70年代发生的哈密大领导的农民抗争运动既是当年明显的阶级矛盾的案例。今天，我们看到仍有大批园丘种植工人（以印度人为多）及城市贫民与游民⁴⁰。国家资本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是以某些资本集团得益的形式进行，贪污情况一直无法根治。比较严峻的对立，就是土著特权形成的政治不平等；华、印等族在经济上由于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冲击而渐次处于劣势；华印文教育自从

独立以来就一直处于屡遭压制、自力更生的局面。因而，华、印两族为主的非马来族群一直在民族平等与语文教育问题上一再向当局争取平等相待的地位，企望通过政治的努力，达成撤销土著特权与华、印文列为国家语文之一的诉求⁴¹。由于土著特权与语文教育的论争白热化，1987年，当局担心它最终演变成再次的种族冲突而以“茅草行动”逮捕上百人进行镇压。然而，只要当局仍然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和教育的狭隘民族主义或一些学者称为种族国家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政策⁴²，华、印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诉求始终不会间断。

结论

四十年的发展，新加坡以严刑峻法管制社会；以“指导民主”方式引领新加坡的政治；以“高薪养廉”及制度化反贪措施杜绝亚洲盛行的贪污恶习和行为；务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民生政策，不断改善人民的住房与生活环境，以

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资创建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从不断的积累中再以国家资本进行高科技的投资与发展，从所得利益中进行再分配，用在国家建设与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李光耀以其独到的视野和廉洁与高效率的行政组织，造就新加坡为一艘在全球化波涛汹涌的经济海洋中急速前进的现代渔舰，捕获甚丰。今天，新加坡已成就为一个中产社会，是一个所谓公有社会（Communitarian Society）⁴³。经济的成就与民族平等政策的切实施行，使得国族营造具有一定的基础，危机意识与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维系着国人朝向一个目标前进，有望建设成“新加坡国族”而完善为真正的多元民族国家。努力的方向将是民主政治逐渐代替威权统治，趋向建设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它的隐忧是威权政治统治下，人民，尤其年轻一代显得对国家政治漠不关心，一些人在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享乐主义，崇尚西方放任的自由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由于新加坡的成就而具

⁴⁰ 马来权贵之间的斗争较突出者见于马哈迪于五一三事件后向建国总理东姑阿都拉曼的挑战，导致马哈蒂遭开除出党。继之为马哈蒂当权时，东姑拉沙里的对抗造成巫统的分裂，东姑拉沙里另组四六精神党与之抗衡。此后，更有副首相安华挑战马哈蒂而惨遭撤职、开除党籍、逮捕坐牢、官司诉讼等情，最终导致支持安华的中小资产阶级发动“烈火不息”（Reformasi即改革的音译）的街头抗争与公正党的成立。新经济政策以及马哈蒂政权的经济开放与鼓励外资的政策虽然带来长足的发展和繁荣，却也进一步扩大了贫富悬殊的差距，园丘工人备受剥削、马来农民、渔民、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因经济发展衍生的生活成本的提高，陷入生活的困境。丧失土地的农民与失业的园丘工人流入都市寻求生存，造就了都市贫民窟，他们成了都市发展与建设的阻碍，他们与私人或官方发展机构之间的斗争从不间断。

⁴¹ 于大选前1999年9月，代表2095个华团的华团诉求委员会向马哈蒂政府提呈了83点诉求提案，主要根据马哈蒂提出的建立和打造“马来西亚国族”的理念，要求政府检讨现有国策，包括马来人特权、土著与非土著、民族教育、内安法令、各族宗教平等提案，这引发了马来当权权贵、马来社团、特别是极端分子的强烈反应。论争持续不断。马哈蒂最初基于大选的需要，接受了提案并表示同意其中大多数的建议。大选过后，对诉求的论争聚焦在马来人特权问题上，马来团体强烈反对，有关当局亦一再申明不会废除特权法案。马哈蒂更一改其态度，攻击诉求的做法与马共无异。由于诉求运动在有关当局议论操纵下形成了严峻的种族紧张局面，诉求运动最终于2001年1月5日与当局达成协议，基于种族紧张原因同意将诉求提案暂放一边（有关当局则宣布为放弃）。参阅：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第66-72页。

⁴² 参阅：Cheah Boon Kheng: 扞thnicity and Contesting Nationalism in Malaysia? in Cheah Boon Kheng (e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ity Building a Nation in Malaysi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第43-44页。

⁴³ Chua Beng Huat: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第184, 191页。

相当的优越感变得自大而肤浅，对区域性的或本国的民族问题毫不敏感，可能形成“丑恶的新加坡人”。就国家的位置而言，全球化的新环境，新加坡如何适应与保持其优越的竞争性，如何拓展知识经济的空间，维持新加坡在东南亚领先的经济地位，如何在地缘政治、经济与军事的操持中维持平衡，确保区域和平与稳定，将是新加坡作为世界上一个小红点的持续的挑战。

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成为立国的难题，英殖民政权的“马来亚联合邦计划”埋植了一个种族冲突的定时炸弹。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以种族集团主义或族群主义（Communalism）立国⁴⁴，土著特权把人民分成主次、土著与非土著两种公民，权力与地位不平等。非土著被迫接受这个宪法。成

立马来西亚后，这个争议放到了台面上而终至新加坡遭排除出局。此后，狭隘马来民族主义或种族国家主义一致主掌着马来西亚的政治。五一三事件后，以紧急法令维持了长达一年九个月由国家行动理事会近乎军管的统治，并在其间实行了一连串纯粹利于马来族的政策与措施，包括颁布“国家原则”（Rukunegara）⁴⁵、新经济政策、修改颠覆法令等。这“国家原则”是拉萨政权为巩固巫统政权，是新一轮营造“马来亚国族”的国家意识形态。其冠冕堂皇的五个信条强调民主、平等、公正、自由与进步的社会以成就一个团结的国家，仍然在不可动摇的土著特权的基础上来完成。颠覆法令的修改为杜戒非马来族群公开对马来语为国家语文、土著特权以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非议与质疑⁴⁶。

拉萨政权的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马来种族国家主义的霸权地位及其主宰营造国族的意识形态。马哈蒂当权后，为回应“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种对立的国族概念，提出2020宏愿⁴⁷，即国家建设及“马来西亚国族”的国族营造的意识形态。宣称将改造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度发展、现代化、公正与平等的先进民族国家，到时“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⁴⁸将形成。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国族”将是全马人民努力建设的目标。这或许是马哈蒂个人或者是巫统的愿望，除非土著特权能在宪法上剔除，否则，“公正与平等”的宏愿只是空谈，“马来西亚民族”也始终不会实现。马来西亚虽然立国已经数十年，但国族营造还远远有待努力。它是，也仍将是多元化种族、文化、宗教立国或

⁴⁴. 1947年，英帝殖民政权与苏丹及巫统达致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便规定了马来族作为土著的特权。英帝以其分而治之的政策落实到宪法中，从此形成马来亚及后来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局面。参阅：Khong Kim Hoong: Merdeka! British Rule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in Malaya 1945-1957, Kuala Lumpur, Strategic Inform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SIRD), 2003, 第108-175页。Albert Lau: The Malayan Union Controversy 1942-194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Vejai Balasubramaniam: The Politics of Communalism and Egalitarianism in Malaysia in Cheah Boon Kheng (e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ity Building of a Nation in Malaysi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第139-153页。

⁴⁵. 五一三事件发生15个月，于1970年8月31日国庆日，联盟政府以国家元首的名誉颁布了“国家原则”（Rukunegara），确立之为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原则”基本五项原则为：1. 相信真主，2. 效忠国家与元首，3. 遵从宪法，4. 依法办事，5. 良好行为与道德。解读为：遵从宪法的意义在于伊斯兰教的崇高地位、马来人作为土著的不可争议的特权与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或团体可在不触犯他人或团体的敏感性去办理他们的事务。“国家原则”虽然仍然强调和平、公正、民主、平等与自由的基本理念，却进一步加强了马来人的土著地位和特权以及伊斯兰教的不可争议的崇高地位。参阅：Gordon P. Means: Malayan Politics, 2nd Editi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6, 第401-402页。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第132-134页。

⁴⁶. 五一三种族大屠杀事件后，敦拉萨政府颁布了一个紧急政令，修改了颠覆法令，不准任何人质疑联邦宪法第152及153条或181条有关规定。这些条文是：元首的权力与优越性、公民权法、马来语为国家语文和官方语文、土著的特殊地位与权力、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地位，任何公开的质疑或责难将视为触犯法律而受制裁。参阅：Gordon P. Means: Malayan Politics, 2nd Editi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6, 第402页。

⁴⁷. 参阅：马哈蒂1991年2月28日对马来商会的演讲：《马来西亚，前进的道路》（Malaysia, The Way Forward），他在这次演讲中提出了他著名的建国宏愿《2020视野》或称《2020宏愿》，期望在2020年使马来西亚最终成为先进国家。参阅：Dr. Mahathir Bin Mohamad: The Way Forwar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⁴⁸. 马哈蒂于《2020宏愿》建国蓝图提出的打造“马来西亚国族”的理想图景。“马来西亚国族”的概念引发了另一轮的论争，然而马来族群的反应却非常冷淡。有关“马来西亚国族”的讨论，参阅：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第65-66页。Amarjit Kaur & Ian Metcalfe (ed): The Shaping of Malaysia,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9, 第95-96页。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马来种族国家主义(Malay Ethno-nationalism)之间的长期斗争。

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多元社会”，作为标志性的种族身份变得更为重要，而且种族、宗教和语言是其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兼容、忍让、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谐团结、并以平等的法律加以保障，才是多元民族社会或国家和平生存之道。从新马推行的所谓种族集团主义或族群主义(Communalism)与单边的马来种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马来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看来，要实现这种宏愿将遥遥无期。无论新马，今天已经以国家机器来诠释与发动全民运动来推动国族的营造。新马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于马来西亚包含着文化差异与种族不平等因素，被边缘化的族群将难于认同，因而国族塑造的进程即使以国家机器强力执行亦将极其缓慢，甚而难于成功。

在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变

得无关重要，民族或文化意识形态替代了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在世界各地，民族紧张关系持续上升。巴尔干半岛与地中海地区，意识形态的瓦解立即变成民族对抗，南斯拉夫因之解体。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族人之间的古代冤仇再次演变为灭族行动。阿拉伯世界源自同一本经文而后发展为希伯来教、基督教、东正教、及回教交织着民族差异而演化成跨世纪的宗教、种族战争，至今犹烈并扩大到世界范围，美国的霸权与单边主义激化了这一情势，由此渊化的穆斯林原教旨极端主义形成全球恐怖主义⁴⁹。在日益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日益激化的趋势，它甚至成了一个民族在观念领域寻求扩张的主要形式。二十一世纪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袭击在在都呈现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⁵⁰的论断有其一定的道理。

新马四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前期以政治为主导、后期以经济

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改变着它的进程，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新环境中，新马社会将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进？会各自发展成怎样的社会类型？新马将会越走越远还是会朝向相同的路径？新马还会否在全新的条件下重新合并？这些都是新马人民关注的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假如新马两国都已进入中产社会，各民族人民均富，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彼此间的差异，或许新马有可能重新再走到一起，那会是一个美丽的图景。

(2005年12月)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隶属研究员)

(本文曾发表于《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页251-278，Oct. 2006)

⁴⁹ 犹太人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强占巴勒斯坦土地立国，但却阻扰巴勒斯坦人建国，引发巴勒斯坦人的长期抗争。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引发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回教徒的愤怒，巴勒斯坦人以及回教同情者，不断武装袭击以色列并因此扩大为两次以色列与埃及的战争。之后，区域性恐怖主义盛行。布什上台后，采取霸权政策，实行单边主义，引发更为强烈的反应，终于造成以本·拉登主导的Al-Qaeda穆斯林原教旨地下武装组织，于2001年9月11日以四架民航机分别袭击纽约世贸中心、五角大厦、总统府或美国国会(未曾成功)，造成共2986人死亡的惨剧。Al-Qaeda并联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在全球各处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层出不穷。较大事件如2002年10月12日，回教祈祷团在印尼峇里岛旅游区以炸弹袭击，造成202人死亡，330人伤，最近一次则在英国伦敦金融区等地铁站及公共巴士引爆炸弹，造成90人死，1000多人伤等。

⁵⁰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8.

关于马共研究的史料探源

陈松沾
(地理系第七届)

马共研究的史料类别

马共研究最主要的困难是史料来源。这原自马共本身的性质及其斗争特点。除了日降后的两年零十个月的所谓平时时期,作为联军的抗日同盟军的马共,享有公开合法政党的待遇之外,其他任何时期都是一个非法的政党。殖民地时期的英殖民政府或后来独立之后的联盟政府都竭尽所能、动用一切国家机器,以数十倍于马共游击队的军警来镇压马共。由于是一个地下政党,马共无法完好地及有系统地保存自己的档案。不是在战乱中不断转移、不得不四处埋藏或销毁其文件记录与资料,便是为剿共部队剿获而成了当局所寄予的追踪线索和分析马共党军动向的重要资料。

正因为马共是有关当局意识形态的死敌,因而对马共文件特别重视,从而为马共的斗争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他们的目的是明晰的,那就是要从中了解和分析马共的组织情况、政治纲领与方针、路线与策略、军事部署、行动、策略与战略、民运的布置与交通的运作等详情。用来以建立相应的剿共策略与战略、部署与行动。这些马共文件资料是当局剿共心理作战部的工作对象和依据。现在马共已经放弃了武装斗争,党虽然一直没有公开宣布正式解散,但也实同终结。所有党员已经不再过组织生活,各自营生,解决生活问题,不再受党的约束。有关马共的一切文件资料自然成

为史料。

虽则按国际档案惯例,这些史料档案早已超过30年的期限,但新马有关当局却始终把这些马共的史料档案划归绝密档案,不予公开。只有少数权威人士和特别获得授权的学者得以翻阅使用之外,其他人士一概不获批准参阅。这些封存的马共史料档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马共各时期的政治斗争纲领、宣言、声明、政策及相关说明与指示;

2、马共各时期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及相关资料;

3、马共各时期的军事部署、指导文件、通知与批示;

4、马共各州州委会会议记录及相关资料;

5、马共各时期各地区区委会的会议记录及相关资料;

6、马共各时期各独立队(抗日时期)、各支队(抗英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地区的地下报章、书籍和宣传资料、传单;

7、马共各时期各党军单位的内部文档;

8、马共各民运单位的宣传文档、宣教资料;

9、马共各时期各党军单位的来往信函、批示和通知;

10、马共各时期各党军单位与地下单位、组织的来往信函及相关资料;

11、马共党军人员的个人信函、笔记和日记等资料;

12、有关当局(政治部与剿共

部队)整理的马共党军人员的个人档案资料;

13、有关当局(政治部与剿共部队)整理的关于马共各时期党军活动的情报与档案资料;

14、有关当局(政治部与剿共部队)研究和分析马共活动的报告与相关资料;

15、有关当局(政治部与剿共部队)各时期对马共作战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组织、部署、策略与战略、具体行动的报告与相关资料。

马共研究的史料来源

现存马共史料档案分别储藏于下列各处:

1、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

收藏于此的马共档案除个别档案如《民声报》、《战友报》等报章原件之外,大都是原属马来西亚政治部、心理作战部及各军警部门所拥有的、数量可观的马共文档。这些文档也大都是原件。特别丰富的是紧急状态及其后阶段的作战双方的文档资料。这些档案资料经由政治部与军警部门转移至马来西亚档案馆,但仍属机密档案,不予公开,除非获得马来西亚内政部的特批函件,任何人不得参阅。

2、新加坡内政部

其收藏不下于马来西亚档案馆。除战前及战后马共活动资料之外,亦拥有部分紧急法令时期的马共文档。新加坡政治部沿袭英殖民时期政治部的运作,特别专注于马共在新加坡的活动,故而举凡有关马共在新加坡的地下斗争资料掌握得更为详尽和具体。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据知除必要的交换情报之外,新加坡政治部的马共情报独自拥有。这些文档史料除部分存放于内政部博物馆作为展览用途外,其余悉数仍

然封存于政治部的档案署中。除个别权威人士或特许学者有幸阅览外，其他申请一概不获批准。

3、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

马共与中共关系至为密切。自1920年代起，中共党人便已经南来避难，后来成立了中共南洋临委，并在1930年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正式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隶属共产国际远东局。战后，中共在新加坡的南洋支部与马共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由中共南方局驻香港办事处维持与马共的联系。陈平接任马共总书记之后，曾特地前往香港进行联系并报告马共最新组织与活动情况。据知，陈平亦曾征询中共南方局关于武装斗争的意见。1949年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马共派员前往北京驻守。自此马共长期获得中共的积极支持，马共代表团常设于北京并自1950年以来便在中联部的照顾之下、由中联部提供活动经费和住宿交通等安排开展国际活动。中联部保有相当马共文档资料。1969年始，中共资助建立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于湖南。但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中联部改弦更张以后，改为与各国执政党建立正常政党外交，便切断了与共产国际兄弟党之间的联系。马共于80年初全数撤离中国，有关马共档案予以封存，至今未有任何人获得查阅的机会。

4、泰国官方档案

自1940年代抗日以来，暹罗共产党与后来的泰国共产党与马来亚共产党断断续续、先后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自1950年代起，马共部队，特别是第八支队便经常出入泰境并与泰军有些遭遇。1953年后，陈平移师泰南，建立边区委员会及中央党军机关。之后，与泰军

屡有接触。泰方也设立相应情报组织与军方一同对付马共与泰共。在战斗中剿获或其他搜捕行动，其军方及警方情报部门亦收集了不少马共文档及其他资料。据知，这些档案仍然存放于相关军警部门，尚未移交泰国档案机构。

5、越南官方档案

自日本投降后，越南劳动党曾多次与马来亚共产党有所接触。抗英战争开始后，马共亦向越南劳动党保持一些联系。越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北越政权后，马共与越共更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一度尚有驻越代表处理联系与支援事务。越战期间，马共曾派员在越南战场学习战地医术与无线电通讯技术。1961年陈平也获得越共的协助通过胡志明小径进入北越并由北越安排飞机飞往中国。1966年11月并由越南驻椰加达大使馆斡旋，解救印尼政变后入狱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印尼的代表团成员，资助与安排他们乘飞机离开椰城前往中国。越共主席胡志明亦是马共成立时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及见证人，陈平过境时，胡志明给予热情的接待并进一步巩固了马共与越共的关系，给予马共更积极的支持与帮助。越南官方档案中必然有不少这方面的档案记录。这些档案亦尚未公开。

6、大英档案馆（British Archives，前称Public Records Office）及牛津大学罗德档案馆（Rhode House, Oxford University, England）

大英档案馆保存有大量的战前及战后、特别是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的有关马共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几乎都不是马共文档原件，而属于下列英文文档：

--- 英国外交部（British For-

eign Office）文档；

--- 英国殖民部/署（British Colonial Office）文档；

--- 英国战争署（British War Office）文档；

--- 英国第五及第六情报部（British Military Information Bureau No. 5 & 6 简称为 MI5、MI6）文档；

--- 英国首相署（British Prime Minister Office）文档。

所藏都是一些马共问题和剿共活动的往返信函及官员报告等官方记录，以及有关专家对马共组织和活动的研究和分析报告，如四大卷的《马共基本资料》（The Basic Paper）是研究马共、特别是研究英国对待马共的政治与军事部署必不可少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经已全部解密，供公共人士查阅使用。然而，似乎尚有文档仍然属于绝密档案，不曾列入公开档案之中。比如：作为马共秘书长的莱特及后来的总书记陈平，并无个人档案可资查阅，或仍然属于绝密档案一类。

此外，在牛津大学的罗德档案馆亦藏有大量紧急状态时期的马共档案资料。

自2006年中以来，又有大批绝密档案获得解密，可资查询。

7、澳洲及纽西兰国家档案馆及战争历史博物馆

澳洲及纽西兰，作为英联邦中与大英帝国最为亲密的伙伴，曾积极参与新马剿共军事行动。其国家档案馆及战争历史博物馆均保留不少澳、纽情报局及军方所搜获的马共资料以及其作战记录、官员的往返函件及研究分析报告。自2007年初以来，大批总理署最高机密文档，获得解密，其中有不少冷战秘辛及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共产主义的活动情报，尚

包括澳洲总理与美国、英国相关部门的往返函件。这些档案资料都已公开，可供查阅。

8、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CIA）档案馆及国务院策略服务署（Office of Strategy Services, State Department, USA,简称OSS）

这里存放着中央情报局所收集到的部分马共文件与资料原件，亦包括情报局官员所作研究与分析报告。美国作为反共的国际宪兵，从事在世界范围内关于共产主义活动的调查与资料收集而把相关档案留存下来。其中相当部分文档经已解密，可供查阅。自2006年6月以来，大批中央情报局有关亚洲、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报档案陆续开放，其中不少属于绝密档案（多达上千页），都已获得解密，并公诸中央情报局网页上，可供任何人士查阅、下载。

9、台湾历史档案馆

国民党政权历来重视海外统战关系，国共两党的斗争，在新马持续不断。“国府”政工收集中共及马共在新马活动情报不余力。作为美国反共同盟的尖兵，在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亦将此情报资料转移台湾。之后，亦仍然开展东南亚的反共活动，因而对收集马共的活动资料仍然继续，特别在战后至马来亚独立这段期间，台湾国民党特务在新马活动频繁，搜集马共文档亦有所获。这些档案或存于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10、日本近卫厅档案记录

日本为部署对新马的侵略，二战前即已开展特务活动，收集各方面政治军事情报。

日治时期，其主要镇压及斗争对象便是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沦陷后的一个月，日本警备司（宪兵部）便

成功地逮捕了马共秘书长莱特，可见其情报精准。其所收集的马共文档原件及情报资料可能在日降前毁于一炬，据知部分资料仍保留于东京近卫厅档案记录中。

11、荷兰社会历史国际学院

这是荷兰转收集社会发展历史资料、特别是重大社会运动相关文档资料的档案与研究机构。它收存一整套相当完整的马共第十支队（原马共马来支队）的文档。作为公开档案，可资查询。

12、马共自身的档案

马共自身的档案大都流失于部队转移之中，或埋藏之后不获寻找。幸存的档案据知保存于下列数处：

--- 驻中国马共代表团文档资料分别存藏于北京、长沙及广州某处，有专人保管，部分已转移至泰南合艾与曼谷；

--- 马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北马局）及人民军机关队文档资料储于朱拉蓬公主村（原和平村）第九村；

--- 马共第十二支队档案储于朱拉蓬公主村第十村；

--- 马共第十支队及马来支部、包括其所属公开阵线组织的文档储于朱拉蓬公主村第十二村；

--- 马来西亚共产党（原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及马列派，简称马西共）文档储于朱拉蓬公主村（原友谊村）第一及第二村。

现于朱拉蓬公主村第一及第二村（马西共）以及第九及第十村（马共中央）分别设有马共文物与资料展览馆，藏有部分档案资料。

13、马共党军人员的回忆录及口述历史档案

因为地区分割的原因，各地区马共的活动大多按中央指示以独立进行的方式运作。为保密而

各条战线、各单位人员皆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工作。在没有可资借鉴的文档作为史料的情况下，唯一可资参考的便是党军人员的口述历史资料。所幸尚有大批党军人员可资访谈，保留一鳞半爪的个别地区的历史资料。那些比较有文化水平、尚能执笔书写的党军人员的回忆录则是另一可资使用的原始史料。

近年来，已经出版了为数不下二十余本相关的回忆录，或是个人专集、或是丛书式的合集，都足资使用。只是这些原始材料或有以下诸问题，因而使用时需斟酌、核实，以免造成错误：

--- 个人因记忆衰退等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或有出入；

--- 因个人责任问题或有所回避而对具体事件说明有不实之处；

--- 因事后对斗争失望或因个人原因而以当前主观意念来阐释当时的情况或处境、或以臆想作为事实说明；

--- 借机诬陷敌对者，或以主观主义妄下结论，诸如缺乏任何证据，随意把同志定性为叛徒或逃兵之类，甚或栽赃、张冠李戴等情。

14、其他档案资料

此外，苏联KGB档案馆、寮国共产党档案中应有部分马共相关的少数档案资料。

15、新、马、中、泰各华、英、巫、泰文报章

新、马、中、泰战前及战后各华、英、马来及泰文报章都曾对与马共相关的事件、特别在紧急状态期间曾作大幅度的报导，这些新闻报导亦可资参考。

16、第二手资料

除了上述第一手史料档案之

外，还有大量的二手资料可供参考。这些二手资料可分为下列数类：

--- 各国学者有关马共的研究论著；

--- 各国学者有关马共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多发表于各大学学报或历史与政治学术期刊、专刊之中；

--- 前殖民地官员或新马政府官员的相关著述及回忆录；

--- 前英方及后来马方剿共部队将领及官兵的著述及回忆录；

--- 战前及战后各华、英、巫报章刊载的相关特写与讨论文章。

史料的应用与研究观点

在上述各类史料与资料的使用上，务必考虑其可靠性与可信度，绝对不可轻易据之撰述而引致错误的结论。以下数点或可供参考：

1、报告的真伪：过去学者或研究人员在研究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或马共的历史，依据的几乎都是官方的资料，也就是大英档案馆、牛津大学罗德档案室、殖民署、战争署、首相署、第五及第六军事情报局等部门的档案，再者就是新马政府存放于政治部的相关档案。这些都是英殖民政府与当地相关机构及剿共人员或后来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政府相关部门与情报人员的通信与报告。其立场及观点十分清晰，纯粹站在官方的角度以及居于相关部门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做出报导、报告、警示、分析、评估或评论与有关建议。这当中或有因为职责的原因、责任的落在、事件轻重的影响等利益与利害的权衡、逃避责任、避重就轻、牟取功名与奖赏等等因素，而致小题大做、或大题小作，或避而不

报或报而不实，甚或捏造事实。

2、翻译的谬误：当时官方相关翻译人才欠缺，或未能准确为马共文件作贴切的译述，而致报导走样。举个例子：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正确的英文译名应该是：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政治部人员却把它译成：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把“民族”译成“种族”。大者如名称都出错，其他文件内容的翻译则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样子。因而对这些档案必须给与适当的鉴定与评估，而不能一味信服、全盘照收。

3、原件的佐证：这些研究也清一律都不根据马共的原始资料，即马共的文件来从事研讨与分析，即使提到，也都作为印证官方分析的佐证。换句话说，那些汗牛充栋的所谓学术成果，都是带有偏见，立场与态度都大有问题。官方学者、研究人员、以及后来从事这些研究的非官方学者，都一脉相承不依据马共原始资料从事研究。这里也有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学者或研究人员都不谙中文，无法阅读马共的文件和相关资料，另外的原因是至今官方收藏的相关原始文档始终未曾解密，非官方学者无法涉足这些原件资料，以致至今极少有根据马共的各时期纲领、宣言、政策、指示、及各类文件与文档等原始资料所作的研究，特别是比较全面与深入的研究成果。这便是研究马共历史与问题需要突破之处之一例，必须尽可能依据马共的原始文件来从事研究。

4、观点与立论：由于学者的出身、成长的环境、教育与生活背景、学养的渊源与所受影响、自身学术立场与观点的建立，在在都对该学者的观点的形成产生影响。

但作为一位持学术公正立场的学者，最最需要避免的便是先入为主、片面取证、结论先行的研究态度。特别要避免遭受既定观点的影响去从事研究，更要避免依据官方的观点去做研究而成为官方代言人。这是有失持公正立场、不偏不倚、主持正义的学者的身份及违背其做学问的基本原则与态度。官方以反共、镇压叛乱、摧毁共产主义武装起义作为其立场与观点，因而其立论是先将马共一方定位为打击的对象，是暴乱分子、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匪徒等等，因而举凡马共的一切都是坏的、罪恶的、违法的，因而其诉求都是不被允许的，其一切举止言论都是违法与罪恶的。这是一面倒的，并且以法律、警力、军队、镇压、屠杀来维护其言论的合法性，正确性。而马共的相应的行动与言论便是完全对立的、否定的。我们今天来研究马共的历史，应该从华人参政的历史着手，从一个大时代的背景去审视马共的成立与发展。忽略了当时国际与当地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等因素，就无从了解马共的产生与存在强烈影响的原因，也容易受到官方主观主义的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因而避开既定观点，从马共资料文本原件出发，从新马政治发展历史的角度，以公正的、不偏不倚的立场才能撰写出公允的马共的历史来，对马共各相关课题的研究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隶属研究员）

（原文曾发表于《中文·人》，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出版，页 88—93，Nov. 2006，2007—10—20 修订）